

社会保障制度的不确定性影响社会预期

宋宝安

(东北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 尽管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但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制度惯性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对社会预期这个关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全局的因素形成至关重要的影响, 降低了终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阻碍了扩大内需基本国策的顺利实现。改善社会预期的关键, 在于稳定社会保障制度,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健全社会保障服务体系, 让全体人民都有机会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关键词: 社会保障制度; 不确定性; 消费率; 社会预期; 扩大内需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3) 01-0001-07

不确定性是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某种不确定性, 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预期进而影响内需的因素, 对经济增长形成掣肘效应, 对社会稳定也构成一定威胁。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确定性对社会预期的影响, 破解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发展困局, 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增强综合国力, 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社会预期关系社会经济发展全局

社会预期是指公众对未来社会经济状况和生存环境所作的估计。随着社会化程度日益加深, 社会预期已成为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因素。

社会预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新中国发展的历史来看, 在影响 GDP 增长的三大因素中, 消费的贡献率一般在 60% 以上, 投资的贡献率一般在 30—35% 之间, 净出口的贡献率在 $\pm 10\%$ 之间。^① 不难看出, 经济增长率与消费率存在非常强的依存关系, 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消费旺盛时期, 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消费低迷时期, 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率下行比较快的时期。不可否认, 长期过高的消费率, 会对投资形成挤压作用, 使投资规模萎缩, 导致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降低。但如果消费率长期过低, 也必将导致生产能力的高速扩张与消费水平过低的矛盾, 无法避免以生产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 破坏经济增长的正常趋势。由我国的国情和国际环境所决定,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都必须走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经济道路。而社会预期是影响我国公众消费进而影响内需扩大的最重要因素。在公众社会预期高涨的时期, 人们敢于消费, 经济增长迅速; 而在社会预期值处于低潮时, 公众风险意识增强, 社会不安全感强化, 人们不敢消费, 普遍采取极力扩大储蓄规模的策略, 以备未来养老、住房、子女入学、医疗等各方面支出所需, 使消费这个社会生产的起始环节和终端环节受到严重影响。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07&zd049)。

作者简介: 宋宝安,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首批匡亚明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 社会保障理论与社会管理。

^①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来。

消费预期作为社会预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人们消费水平的关键因素。如果消费者预期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收入大于支出，秉持乐观预期，则会增加现在的消费支出，减少储蓄；如果消费者认为未来的支出大于收入，秉持悲观预期，则会减少现在的消费，增加储蓄。^①比如1978—1982年的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人们对未来的收入与支出的预期也比较平稳，对未来充满信心，情绪乐观，消费水平明显上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78年的61.8%上升到1982年的68.7%。1990年后，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好多过去由国家和企业承担的支出，改变为由个人承担一部分或大部分。因收入不稳定，支出不确定，人们的社会预期值低，消费水平下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到55.8%。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市场疲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社会预期悲观所导致的。据统计，居民消费率已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比世界同期平均消费率（62%）低23.8个百分点，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58%）的平均水平。2009年我国居民消费率随着世界平均水平的上升而有所上升，为48.6%，但仍比1989年以来的世界平均消费率（78%）低29.4个百分点。^②中国GDP增长长期依赖对外贸易顺差和投资，而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过低消费率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们没有消费能力，而是由不确定因素造成的。以储蓄率为例，2001年为38.9%，2005年上升到47.9%，2011年上升到52%，这在世界大国经济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速度之快极为罕见。储蓄存款余额，20世纪80年代初期只有几千万元，2011年已高达35.2万亿，占当年GDP总额47万亿的74.9%。^③这充分说明人们的心理预期对消费的影响程度之深和范围之广。

在当前形势下，有效提高国内消费需求，更好地应对世界经济失衡、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冲击，避免国内生产能力过剩而引发经济危机，更好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必须提高社会预期。

此外，社会预期关系着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力度。改革成功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和参与程度。在新制度学派看来，“如果预期的净收益将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④。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社会个体之所以支持改革，是因为他们认为改革的预期收益将超过支持改革可能付出的预期成本，否则就会反对改革。但是由于制度的整体性变迁的时段较长，其中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人们对于改革导致的收入预期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迫使社会不同阶层不断修正对待改革的态度。正如诺斯所言“一个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入预期的改变会导致它们对建立新制度安排的态度全面修正。”^⑤另外，由于社会成员有着相对于制度“现期消费”而言不同的内含贴现率，致使其对于制度的“预期净收益”中“预期”的时间期限也不相同。“如果某个社会阶层所面临的贴现率越高，该社会阶层就越有可能选择倾向于当前报酬流量的安排。”^⑥人们的收入水平不同，对改革的态度也有一定差别。对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来说，因为贴现率高而更看重即时举措所造成的即时成本与即时收益的比率，并以此决定其对改革的态度。而那些收入较高的阶层，由于贴现率低而比较看重时滞相对较长的预期。总之，人们对于改革的态度，取决于其自身利益的实现程度。人们热情支持改

① 任太增 《收入支出不确定性与中国消费需求之谜》，《中州学刊》2004年第2期。

② 参见顾纪瑞 《中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的原因及对策》，《消费经济》2011年第6期。

③ 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④ R. 科斯、A. 阿尔钦、D. 诺斯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4页。

⑤ R. 科斯、A. 阿尔钦、D. 诺斯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9页。

⑥ R. 科斯、A. 阿尔钦、D. 诺斯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5页。

革，往往是因为对改革将给他们带来的预期收入期望值较高所致；人们漠视或反对改革，则往往是由于改革将给他们带来的收入预期很低甚至为负数造成的。我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一开始就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主要与人们对改革能够给他们带来好的预期有直接关系。所以，提高人们的社会预期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参与改革的必要条件。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确定性及其与社会预期的关系

社会保障制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发挥着保护弱者、促进公平的作用。事实证明，任何国家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都离不开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发挥着稳定社会、防止经济过热的独特功能。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改革势在必行，改革产生的不确定性也就在所难免。然而，人们长期忽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简单地认为只要改革社会保障就一定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看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变化所形成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不确定性，尚处在探索、实验和试点的阶段。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包括养老、医疗、住房、失业、教育等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全面改革，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相继出台。这些改革的制度规定和政策措施给人们的感觉是：任何一项改革，老百姓都要承担一部分或大部分费用，都要自己掏腰包。1992年出台了《关于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开始了高等教育产业化进程，上大学要自行承担各项费用；1994年出台了《关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始了住房商品化和社会化过程，职工住房由福利分房改为个人买房；1997年出台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个人要承担一定比例的养老金；1998年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采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的方式解决职工医疗问题。此后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与社会保障有关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问题，但是也都对社会心理预期产生了一定影响，对经济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诚然，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制度的不确定性。但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社会保障制度的不确定性容易被放大，在公众中形成相对一致的悲观性社会预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着手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对国家、对单位形成了一种严重的依赖心理，应对不确定性、抵御风险的能力被严重削弱，致使许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常自然和正常的事情，诸如企业倒闭、职工失业、看病难等，都会引起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不安，表现在消费方面，就是大幅度减少即期消费，增加长期预防性需求的各方面准备。另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初期，公众对未来的收入与支出无法作出准确预测，任何人都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不确定性存在的“不对称性”，又迫使人们宁可把收入的增加估计得保守一点，把支出的增加夸大一些，也不愿承担估计不足所带来的风险，普遍性的悲观性预期也就在所难免。

三、不确定性影响收入与支出的平衡

收入与支出是社会保障的两个重要变量，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平衡关系，但这种平衡关系常常被打破。学者们试图用不同的理论来预测人们对收入与支出变化的反应。西方学者提出“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来解释收入预期与消费的关系，我国学者用居民消费行为的周期性和阶段性理论进行二者关系的诠释。学者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影响即期消费的基本因素，是消费者对未来收入与支出的预期；消费者往往根据自己对经济发展结果的预期来决定消费规模和消费水平。

在我国居民的实际生活中，消费预期实际是适应性预期。适应性预期理论认为，消费者对未来的预

期如何，既取决于现在的收支比较，也取决于前期的收支变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所进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使公众明显地感觉到收入与支出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很难避免多数消费者对未来作出悲观的预期，从而导致消费需求的不足，形成消费滞障。悲观性预期产生于消费者对未来收入支出的不确定性判断，进而产生抑制消费的攒钱心理，减少乃至停止某些必要的消费。事实上这种攒钱心理既折射了国人的悲观性预期，也打破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无可厚非，但我国的社会保障改革是在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与物质准备的条件下进行的，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过程过于迅猛，人们还来不及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而这种改革给公众的第一感觉是：铁饭碗被打破，原来由国家承担的女儿入学、医疗、住房等福利待遇都将逐步减少乃至取消，改由个人承担，国家甩了包袱，个人增加了负担。尽管我们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初衷，是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不受侵害，但是人们的实际感觉并非如此。事实也证明，人们对未来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相当一部分人下岗、失业、减少了收入，有的甚至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这种情景的传播速度极为迅速，很快为社会公众所认知。在这种情势下，很难避免出现普遍的攒钱心理：为了将来子女上学、为了看病、为了有房子住、为了养老，必须攒钱。攒钱心理是人们对未来悲观预期的明证。据央行2011年第四季度发布的全国50个城市2万户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揭示：高达82.4%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仅有17.6%倾向于“更多消费”。2005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也显示：中国的储蓄率比发达国家高出10%，仅次于海地，世界排名第二。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人们并不普遍富裕的情况下，储蓄率如此之高，极不正常。

毋庸置疑，必要的积累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积累率过高，积累速度过快，就要出问题。目前我国积累过度问题比较严重，并以叠加的速度发展。

1978年以来GDP增长率与居民储蓄增长率比较

年份	GDP 总额 (亿元)	居民储蓄总 额 (亿元)	GDP 总额增 长率 (%)	居民储蓄总 额增长率 (%)	年份	GDP 总额 (亿元)	居民储蓄总 额 (亿元)	GDP 总额增 长率 (%)	居民储蓄总 额增长率 (%)
1978	3645.2	210.6	11.7	16.0	1995	60 793.7	29 662.3	10.9	37.8
1979	4062.6	281.0	7.6	33.4	1996	71 176.6	38 520.8	10.0	29.9
1980	4545.6	395.8	7.8	40.9	1997	78973.0	46 279.8	9.3	20.1
1981	4891.6	532.7	5.2	32.3	1998	84 402.3	53 407.5	7.8	15.4
1982	5323.4	675.4	9.1	29.0	1999	89 677.1	59 621.8	7.6	11.6
1983	5962.7	892.5	10.9	32.1	2000	99 214.6	64 332.4	8.4	7.9
1984	7208.1	1214.6	15.2	36.1	2001	109 655.2	73 762.4	8.3	14.7
1985	9016.0	1622.5	13.5	33.6	2002	120 332.7	86 910.7	9.1	17.8
1986	10275.2	2237.6	8.8	37.9	2003	135 822.8	103 617.7	10.0	19.2
1987	12058.6	3073.3	11.6	37.4	2004	159 878.3	119 555.4	10.1	15.4
1988	15 042.8	3801.5	11.3	23.7	2005	184 937.4	141 051.0	10.2	18.0
1989	16 992.3	5184.5	4.1	36.4	2006	216 314.4	161 587.3	11.6	14.6
1990	18 667.8	7119.6	3.8	37.3	2007	265 810.3	172 534.2	11.9	6.8
1991	21 781.5	9244.9	9.2	29.9	2008	314 045.4	217 885.4	9.0	26.3
1992	26 923.5	11 757.3	14.2	27.2	2009	340 902.8	260 771.7	9.2	19.7
1993	35 333.9	15 203.5	14.0	29.3	2010	401 202.8	303 302.5	10.3	16.3
1994	48 197.9	21 518.8	13.1	41.5	2011	471 563.7	351 957.0	9.2	15.5

说明：1. 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1)。

2. GDP 总额增长率是按照剔除物价因素的可比价格计算得出的年度实际增长率；

3. 1978—2011 年 GDP 年均增长率： $(471563.70/3645.2)^{1/33}-1=15.9\%$ ；1978—2011 年居民储蓄年均增长率： $(351957.0/210.6)^{1/33}-1=25.2\%$ 。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储蓄年均增速为 10.3%，其中 1978—1982 年均增长率为 6.5%，1983—1991 年均增长率为 11.6%，1992—1997 年均增长率为 37.1%，1998 年后增长率仍然高位运行，逐年递增。储蓄和消费从来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储蓄存款的迅猛增长必然带来居民

消费水平的大幅下降。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绝对值在增加，但是增长速度却远远低于同期储蓄的增长速度。

总之，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及其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不得不加大储蓄，以备将来购房、养老、医疗、子女上学之用。而作为二次分配的最主要手段的社会保障对初次收入分配不公的调整力度又极为有限，难以改变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进而导致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结构出现显著差异：高收入阶层因其富有而边际消费需求下降，而边际消费需求高的低收入层，受其购买力严重不足的限制，商品消费量增加缓慢。收入高的无需消费，收入低的无力消费，一高一低，消费市场需求低迷疲软的状态很难改变。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导致人们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障意识明显增强，这对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无疑是件好事，但是对提高消费水平扩大内需则起了极其严重的抑制作用，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保障制度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影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只注意其对社会的稳定作用，也不要以为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就一定没有任何负面影响。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确定性，建立能够使公众安心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现期收入与支出矛盾、改善悲观性社会预期、提高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公众收入水平

温家宝总理早在 2006 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曾明确提出：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预期，扩大内需。这是一个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出发进行规划的战略构想，揭示了社会预期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维护社会稳定，还要考虑这种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把影响社会预期作为主要指标。忽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负面影响，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1.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社会预期

尽管公众的社会预期不一定是准确的，其根据也不一定充分，但它对人们的消费行为确实有着很大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相继启动，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下岗失业的潜在风险，使得公众形成了“未来减收增支，不确定性加大”的预期。尽管政府想尽办法引导人们去花钱，但消费却启而未动，“惜购”心理比较严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逐年增加。而最近几年的通胀，过高的物价又造成了人们的恐慌心理，推高不良心理预期，导致人们增加储蓄，影响了扩大内需基本国策的顺利实现，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在物价上涨较快时，人们对物价上涨的预期比物价上涨本身更可怕。”^①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调整即期消费与远期消费的关系，把分散的个人安全储备转换为社会统筹的安全储备的最有效方式。社会保障体系的发育过程实际上是远期消费社会化的过程。实践证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动员”出巨大的即期消费需求。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既可以缩短社会成员收入与消费之间的数量差距，也可以缩小收入与消费之间的间隔时间，使消费需求得到持续性扩张。

扩大内需是关系全局的大事，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则是扩大内需的题中应有之义。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指出：中国能否扩大内需，取决于能否建立健全覆盖全体国民的养老、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国内储蓄率已经达到 40% 以上，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因而促进国内消费非常重要。建立起诚信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养老金体系、医疗保健体系、教育体系、住房体系等等，因应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造就国内居民对未来

^① 温家宝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答中外记者问》，2008 年 3 月 18 日。

生活的良好预期，对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意义十分重大。^①

2. 尽早制定《社会保障法》，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社会保障制度转移和分散风险的功能，是通过大数法则实现的。社会保障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广泛覆盖性，只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扩大覆盖面，广泛积累社会保障的物质条件，才能保证社会保障的兑现水平。但是由于我国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在公众普遍缺乏统一意志的情况下，很难统一行动。所以，必须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依靠法律的力量，把所有社会成员都纳入社会保障安全网中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调整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未来方向，是实现社会福利制度化、法律化，保证全体国民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本源性制度。如果我们能够将社会保障制度法制化，将社会保障对象的权利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就会有效减少社会保障制度运行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安全运行，有效遏止拖欠和拒缴、逃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

我国社会保障立法严重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虽然出台了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失业保险条例，但是还没有一个内容全面的社会保障法律出台。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的执行力、约束力不强，层次不高，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社会保障的立法应该成为今后立法的重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立法经验，把社会保障建立在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基础之上，对保障人和被保障人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是提高我国社会保障能力的关键所在。当然，在学习和借鉴中，不能照搬照抄，要结合中国国情。比如，我国实行资金征缴的现收现付与部分积累相结合的制度，是根据我国人口结构特点和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确定的，与西方国家的“现收现付”完全不同。我们在学习西方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应该努力避免重蹈其失败的覆辙。特别是要注意社会保障水平的适度性，减少过高或过低所造成的损失，建立既能够保证社会保障对象的基本生活需要又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机制灵活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当前，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特别注意通过法律的力量消除人们对未来的担心。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提高人们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障意识，但是也不可忘记社会保障制度对公众社会预期的影响。应该把对社会预期的影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标准。千万不要给公众造成“社会保障改革就是国家减轻负担，老百姓多拿钱”的印象。要解决发生在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在提高人们风险意识和自我保障意识的同时，提高人们的信心指数。在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基本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及时出台配套的相关政策是很有必要的，以减轻民众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缺失而产生的生活压力，提振公众信心，降低风险预期，把长期储蓄转换为即期消费，改变长期存在的消费增速大大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不正常状态，实现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和积累增长同步发展的良性目标。

3. 努力解决就业问题，从根本上提高各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战略，甚至一个时期以来，政府鼓励企业“减员增效”，企业无端向社会排放劳动力的现象十分普遍。“效率优先”政策实施的结果，影响了就业，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公的持续扩大，造成了居民生活的严重两极分化，不仅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严重影响了公众的社会预期。这就要求政府决策部门真正扭转长期以来过于重视GDP增长、过于忽视解决就业问题的倾向，^②从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战略大局出发，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降低“减员增效”策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创造长效机制。

就业对增加消费意义十分重大，大幅度地增加就业是扩大消费、改善投资与消费结构的关键环

^① 刘遵义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讲话》，《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3月22日。

^② 孙立平 《扩大内需还是满足内需？》，<http://blog.sociolog.com>。

节。从2001到2010年的10年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从681万人增加到908万人,年平均增长3.28%;实际失业人数从1087万人增长到2283万人,平均年增长8.54%。^①如果包括农村闲置人员在内,全国有5000万没有稳定工作岗位和收入的人员,假定他们都能就业,一个劳动力年均工资1万元,就可以使消费拉动GDP增加3.5个百分点。^②反之,如果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就会造成“就业越是不足、消费越是不振、经济发展就越是困难、就业就越是不足”的局面,形成恶性循环。如果能够大量而有效地减少失业,积极增加就业,消费水平就会快速增长,消费拉动GDP增长的作用就能够得以更好发挥。事实证明,只有居民的消费需求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永恒动力。

4. 完善公共财政支出政策,稳定居民支出预期

政府应该从制度上、政策上进行改革,扭转公共支出比重过低、向公众转嫁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的倾向,消除居民悲观预期,保障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从消费者方面看,他们的即期消费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现期收入,二是未来收入预期。造成目前高额居民储蓄的主要原因,是居民的社会保障预期支出(包括失业、住房、养老、医疗、保险、教育等项开支)增加,并且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因此,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大力提高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扩展社会保障网的覆盖面,加大医疗保险、住房保障、教育扶持等的政策支持力度,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和运行中的主导地位,尽快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刺激消费的稳定增长,把提高社会预期作为社会保障改革和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

目前应该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高农民收入。多年来,农民收入低而消费倾向高。如果农民收入水平能够接近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内需将会大幅度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更加明显;第二,强化第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中的职责,把应该承担的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方面的义务,切切实实地承担起来;第三,通过适当的政策干预,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只有这样,经济发展才能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永不衰竭的动力,实现经济发展的动力与社会保障目标的高度一致。

5. 培育和壮大中产阶级,促进有效消费

中产阶级是有一定经济实力、消费能力和投资条件的比较富裕中等收入阶层,培育中产阶级是构建和谐性消费社会、促进社会稳定的需要。201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比重达到25%,但是由于教育、住房、医疗等刚性支出的增长较快,致使部分中产阶级抗御风险能力变弱,已经出现向低收入阶层流动的趋向。

重视中产阶级在经济稳定增长中的作用,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在历次经济危机中之所以能够最终实现经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庞大的中产阶级发挥了作用。造就我国强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既需要出台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相协调的政策,也需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征收体系,还需要通过微观劳动与分配机制的改革,保障劳动者平等地与雇主分享利润的权利,加快收入分配领域的法制化建设。中产阶级中的低收入群体,一般年收入在5万到8万元之间,难以实行多元化投资,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是一个摇摆于贫困阶层与富裕阶层之间的脆弱阶层。扩大中产阶级规模,提高其抗风险能力,需要合理调控工资,不断提高这一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加强对这一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其社会参与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努力规避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而重新跌入贫困阶层的后果,促进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为顺利实现扩大内需的基本国策奠定坚实基础。

责任编辑:王永平

^① 国家统计局 《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

^② 杨曼、董颖 《挣得多才能花得多》,《市场报》2005年12月26日。